

2018年10月 总第87期

国外研究生教育动态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主办
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育教学与人才成长研究中心承办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
www.csadge.edu.cn

评论	1
学术研究出版过度膨胀	1
英国硬脱欧给研究生科研带来的风险	2
国际新闻	2
欧洲: 激进的开放获取计划将终结期刊订阅业务?	2
英国: 不切实际的科研成果指标将造成青年学者流失	3
英国: 人工智能人才从高校流失	4
丹麦: 哥本哈根大学缘何获得 “地平线 2020” 的高额资助?	4
爱尔兰: 爱尔兰将建立第一所工业大学	5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决定缩减国际学生招收规模	5
印度: 政府严厉打击欺诈性期刊	6
非洲: 三十名未来科学家获得女性专属奖学金	6
学术前沿	7
《学者的工作满意度: 科研产出的作用》	7
《研究小组作为实践共同体——关于四个高绩效研究小组的案例研究》	7
《学术界商业人士的边界工作: 对博士后培训的启示》	8
书籍推荐	8
《知识社会的博士生教育: 趋同还是分化? 》	8
《创业教育中的体验式学习: 从理论与实践的视角解读创业教育》	9
专题: 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形象 (评论/新闻/学术前沿/书籍推荐)	9
中国——新兴的国际高等教育枢纽	9
中国终止国际高等教育项目意味着什么?	10
中美两国引领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11
中国正在崛起: 中国的研究影响力有望超越美国	12
教育投入推动中国创新指数排名提升	13
中国正在成为非洲学生的主要留学目的地	14
《来华留学生的就读经历研究: 规划性逆向流动是否有效? 》	14
《高等教育与中国的全球崛起: 一个新视角》	15
《来华留学生: 教育、学生生活和跨文化交流》	15
读者意见征集	16
版权声明	16

评论

学术研究出版过度膨胀

当前, 学术出版存在一系列问题, 比如顶级学术期刊的压力过大、大量书籍质量堪忧、越来越多欺诈性的期刊和出版商发表粗制滥造的学术研究文章、学者的论文发表压力过大等。这些问题是过去半个世纪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的产物, 尤其受到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大学排名兴起的影响。与此同时, 随着全球高校纷纷效仿世界顶级名校、建设研究型大学, 科学研究的比重也在不断加大。这一趋势也与 19 世纪德国科学家洪堡(Humboldtian)提出的大学具有研究职能的观点有关。此外, 博士生毕业要求中以学术文章发表代替毕业论文的做法也是造成学术出版激增的原因, 这一转变实际上将评估博士生科研能力的责任从大学转移到了期刊编辑和评审的肩上。对学术发表的过度重视使学术出版系统不堪重负, 同行评审系统无法尽其所长, 大学委员会难以有效评价科学研究的质量。据估计, 现有学术期刊总量已达三万左右, 每年发表的学术文章近二百万篇。减少学术研究的发表数量势在必行。

减少学术文章和书籍出版数量能够促进同行评审机制的有效运行, 减少低质量的期刊和出版商, 更重要的是能够减轻学者的学术研究压力, 让他们有精力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和服务工作。在整个高等教育系统中, 仅有少数高校能够成为研究型大学。例如, 在美国 3000 余所高等教育机构中, 仅有约 200 所真正的研究型大学; 英国 140 余所大学中, 仅有 24 所一流的研究型大学组成了罗素集团(Russell Group); 在澳大利亚, 八大名校(Group of Eight)也只是高等教育领域的一小部分。更多的大学是非研究型的, 需要重点关注的是教学而非研究, 教职人员也应凭借教学和社会服务的表现获得奖励, 而非研究产出。

事实上, 所有大学都履行科研职责是对资源的浪费, 也无益于质量的提升。应用型高校应坚持以教学为主, 实现名副其实的应用价值, 而博士学位授予权则应限制在研究型大学。许多国家的博士生人数也应缩减, 同时为非学术导向型人才开设专业博士学位, 与学术型博士学位进行互补。此外, 高等教育系统应保证仅在研究型大学范围内鼓励科学研究和学术成果的发表, 并且只对这类高校提供科研经费资助。如果各类型高校权责分明, 科研质量将会稳步提高, 也会减少近一半的学术文章发表数量。

欧内斯特·博耶(Ernest L Boyer)在 1990 年出版的《学术的再思考》(Scholarship Reconsidered)中提出, 对学术工作的评价应包括学术职业中各方面的责任, 对于非研究型大学而言, 工作评价应主要参考教师的教学水平和社会服务能力。他认为, 学者们需要了解各自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并保持思维活跃, 但并不一定都要创造新知识。当然, 如果非研究型大学中有对学术研究感兴趣的学者, 也可以进行科学研究并发表成果。

为了改变对学术研究趋之若鹜的高等教育发展现状, 各类型高校应明确其办学职能, 将自身发展目标与资源分配相结合, 这并非易事, 因此特别需要政府部门与相关机构来推进, 并邀请学术团体共同参与; 知识的创造与传播需进行重大改革, 政府、研究型大学、专业协会和相关部门应承担更多的责任, 加大监管力度; 欺诈性的期刊和出版商应被彻底清除, 私营出版公司应适当减少, 同行评审制度作

为评价研究质量的主要方法也应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其中, 学术文章产出的削减将有助于这些改革的顺利推进。诚然, 改革的进程不会一帆风顺, 各种改革措施也一定会引起各方争议, 但通过多种改革措施的并行与互补, 高等教育机构与人员同质化的趋势一定能够得到改善。

(翻译 / 白静 校对 / 郑天一)

[来源: 英国《大学世界新闻》, 2018 年 09 月 07 日](#)

英国硬脱欧给研究生科研带来的风险

如果只是简单地从宏观角度来看待英国高等教育体系, 将大学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将学生视为一个统一的群体, 那么我们就无法充分理解英国脱欧给英国高等教育体系带来的风险。不同的高等教育机构具有不同的特点, 因此脱欧对于各高等教育机构产生的影响也不一样, 即便是在同一个大学集团中, 不同大学受到的影响也不尽相同。

针对英国留学研究生对英国科研发展的作用, 系统分析脱欧所带来的风险, 可以看到: 英国脱欧使英国产业发展战略的重要引擎——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学科的发展面临重大风险, 这可能会影响到英国的国家安全。一方面, 在英留学研究生占据了这些学科总体学生数量的多半, 其本土人才匮乏, 例如, 数学、计算机与工程学科的国际学生比例分别达到了 51.9%, 58.2% 和 59.1%; 另一方面, 英国的产业战略非常依赖这些领域的技术转让以及相关的研究成果。其次, 英国脱欧可能会阻碍那些潜在的国外生源来英国就读研究生, 因而其研究系统的生命力受到威胁, 从根本上制约了英国大学在未来发展中成为全球一流高校的能力。

(翻译 / 王莹 校对 / 黄亚鑫)

[来源: 英国《大学世界新闻》, 2018 年 08 月 31 日](#)

国际新闻

欧洲: 激进的开放获取计划将终结期刊订阅业务?

近日, 来自 11 个欧洲国家的科研资助机构公布了一项激进的开放获取出版计划(open-access publishing plan)——“S 计划”(Plan S), 该计划将从 2020 年起强制要求受到相关机构资助的科学家必须保证其研究成果在发表后可被立即免费阅读, 同时, 这些论文将获得自由出版许可证, 允许他人下载、翻译或以其他方式重复使用。“S 计划”标志着开放获取出版运动的重大转变。在此之前, 从网络免费获取科学文献的进展缓慢, 只有约 15% 的文献在发表后可供读者立即免费阅读, 而“S 计划”的目的是阻止受到资助的研究者在其余 85% 的期刊上发表论文, 其中包括《自然》、《科学》等权威杂志, 并禁止混合出版模式。“S 计划”的支持者相信, 论文发表的收费制度不仅妨碍了科学事业本身, 而且也阻碍了广大公众获取科研成果的途径。该倡议由欧盟委员会开放式出版运动特使罗伯特·简·斯密茨(Robert-Jan Smits)率先发起, 到目前为止, 欧洲已有 11 个国家资助机构签署了“S 计划”, 斯密茨预计未来将会有更多资助机构加入。

“S 计划”预期在两年内改变当前科学出版的模式, 这立即引起了出版界的抗议。出版商们表示,

“S 计划”中的部分条款需要进一步考量和审议,以避免对学术自由造成不必要的影响,特别是禁止混合型期刊的规定可能会严重减缓当前开放获取运动和出版模式转型的进展。科学研究与传播是全球性的,科研资助机构应互相结盟合作,而不是组成相斥团体分别行动,政策制定者也应考虑到这一点,否则“S 计划”将可能破坏整个科研出版系统。与此同时,“S 计划”也被认为不利于高质量的同行评审、研究出版和传播,实施该计划不仅可能会对科研人员造成伤害,也不利于科学期刊的可持续发展。

然而,斯密茨表示,高质量的同行评审仍然是“S 计划”中科学出版系统的一部分。出版商不是“S 计划”的敌人,而是变革的一部分。挪威研究理事会主席约翰——阿内·罗滕根(John-Arne Røttingen)认为,如果其他资助机构遵循“S 计划”的方针,这将意味着目前科学出版界主导的订阅业务商业模式的终结,订阅期刊将有机会将其商业模式转变为全新的系统,其中需要付费的为同行评议、编辑审查和研究成果的电子传播等业务。但这一转向或许会带来新的挑战,贫穷国家的科学家可能无力负担开放式成果出版的费用。

(翻译 / 周默涵 校对 / 蒋雅静)

[来源: 英国《自然》, 2018 年 09 月 04 日](#)

英国: 不切实际的科研成果指标将造成青年学者流失

英国大学与学院工会(The University and College Union, UCU)表示,利物浦大学的几名青年学者被学校告知,如果他们不能做到平均每 18 个月发表一篇相当于 2021 年研究卓越框架(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中三星级(即“国际优秀(internationally excellent)”)的论文,他们将不会通过试用期。对于研究卓越框架评级被重新用于大学内部评估以决定试用期学者去留的做法,英国大学与学院工会表示担忧。

英国大学与学院工会利物浦大学分部发言人表示,利物浦大学的内部评估标准要求 2014 年至 2020 年 8 月之间该校每位一线科研人员至少提交一项科研成果,同时各部门每名教职员工平均需提交 2.5 项科研成果,这一标准已经远远超出研究卓越框架的要求,这对于处在事业起步阶段的讲师来说是不合理、不切实际的。该发言人也提到,大学内部的研究卓越框架评分在某种程度上是非常主观的,因为一位同事可能将一项科研成果评为二星,但另一位同事可将其评为三星甚至四星。这样的评分方式不仅会严重影响同事关系、损害团队精神,也无法保证分数的准确性。

利物浦大学发言人则表示,本校对于教职工学术表现的管理办法与学校的能力考核程序相一致,该程序已于 2013 年 6 月与英国大学与学院工会达成一致,主要用于审核学者的人事任命资格。试用期学者需要证明他们已经完成了既定的研究计划或者正在按计划推进,并说明研究达到国际优秀标准的可能性。该校理事会也于 2016 年通过了一套为不同级别学者制定的公开标准,其中也包括了研究质量的评判细则。

(翻译 / 杨建华 校对 / 蓝晔)

[来源: 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 2018 年 09 月 05 日](#)

英国：人工智能人才从高校流失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汇编的数据显示, 英国正面临着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流失, 约三分之一顶级院校的机器研究专家和人工智能高端人才已前往美国硅谷的科技公司就职。

《每日电讯报》调查了 150 名曾在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帝国理工学院、伦敦大学学院和牛津布鲁克斯大学获得研究生学位或担任研究职位的学者。调查显示, 超过十分之一的人工智能高端人才转移到了北美高校, 接近十分之一的被调查者正在为其他较小的美国公司工作, 而只有七分之一的人加入了英国的初创企业。美国为这些高端人才提供了六位数的起薪, 鼓励他们将在稀缺的专业知识带到美国。例如机器学习领域专家、剑桥大学的信息工程教授佐斌·加拉玛尼(Zoubin Ghahramani)日前成为优步(Uber)公司的首席科学家, 谢菲尔德大学机器学习教授尼尔·劳伦斯(Neil Lawrence)受邀到亚马逊领导机器学习研究团队。

英国大学与科学部长山姆·吉玛(Sam Gyimah)表示: “英国是世界上领先的技术国家之一, 是一片诞生创造力和创业精神的净土, 是全球人才的灯塔。价值 10 亿英镑(约合人民币 90 亿元)的人工智能行业协议是英国现代工业战略的一部分, 我们将能够借此不断发挥英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优势”。科技英国(Tech UK)的政策负责人维娜斯·阿里(Vinous Ali)则表示: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这并不是坏事。英国的人才向其他国家流动, 同时英国的高校也在继续吸引海外人才, 这实际上为科技创新提供了一个更好的环境”。

(翻译 / 刘蓉蓉 校对 / 白静)

[来源: 英国《每日电讯报》, 2018 年 09 月 02 日](#)

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缘何获得“地平线 2020”的高额资助？

截至 2018 年 7 月底, 欧盟科研框架计划“地平线 2020”已资助 88,258 个研究项目, 共计分配了 325 亿欧元(约合人民币 2600 亿元)的研究经费。最新数据显示, 获得最多经费资助的大学中, 排名前四位的均为英国的大学, 而排名第五的则是丹麦的哥本哈根大学, 目前共获得 1.77 亿欧元(约合人民币 14.2 亿元)资助, 是欧洲大陆获得最多研究经费的大学。

丹麦研究与创新政策委员会主席、南丹麦大学前校长延斯·奥德谢德(Jens Oddershede)教授认为, 哥本哈根大学的成功有三个主要原因。第一, 大学高层领导人积极推动, 使每一位学者都递交了高质量的项目申请书; 第二, 经济激励措施; 第三, 大量高素质的高级研究人员, 其中包括了相当数量的国际研究人员。维勒姆基金会(Villum Foundation)研究主任、哥本哈根大学研究和创新中心前校长托马斯(Thomas Bjørnholm)认为, 哥本哈根大学的成功源于长期以来丹麦对研究的投资。

哥本哈根大学设立了由 21 名专家组成的科研服务办公室, 各学院也有专门的“地平线 2020”项目负责人, 同时, 哥本哈根大学还参与了哥本哈根欧盟区域办公室的工作。“地平线 2020”资助的科研项目主要分为三大类: 社会挑战、技术进步(工业领导力)和卓越科学。哥本哈根大学获得资助的项目中有 88%属于“卓越科学”大类。

哥本哈根大学的战略之一是在“地平线 2020”项目期间实施奖励机制, 给申请成功的研究项目拨款 100 万丹麦克朗(约合人民币 107.29 万元)。在申请截止之前, 哥本哈根大学还经常举办“大师班”(masterclass)活动, 邀请有经验的学者参与并协助撰写研究项目申请。此外, 哥本哈根大学还努力招收更多不同国籍的学生。这些都是哥本哈根大学能在“地平线 2020”的资助金额排行榜上名列第五的原因。哥本哈根大学董事会表示, 哥本哈根大学将继续关注欧盟科研框架计划, 保持在“卓越科学”这一方面的强势地位, 并挖掘在“技术进步”和“社会挑战”两方面未开发的潜力。

(翻译 / 龚美琼 校对 / 王莹)

[来源: 英国《大学世界新闻》, 2018 年 07 月 28 日](#)

爱尔兰: 爱尔兰将建立第一所工业大学

都柏林理工学院(Dubl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塔拉理工学院(Institute of Technology Tallaght)和布兰查斯镇理工学院(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lanchardstown)合并后, 爱尔兰将按照 2018 年 3 月颁布的新法律规定建立第一所技术大学——都柏林工业大学(TU Dublin)。该校成立后, 三个校区对学生提供的学术、生活和娱乐服务及资源都将进行数字化关联。

政府相关部门称, 该大学的建立是“爱尔兰规划 2040 (Ireland Project 2040)”中的一部分, 旨在推动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 使爱尔兰在 2026 年到来之前拥有欧洲最好的教育和培训服务项目。同时, 爱尔兰高等教育局也为都柏林工业大学的持续发展提供了 440 万欧元(约合人民币 3515 万元)的资助。至此, 该大学建设项目已获得将近 930 万欧元(约合人民币 7521 万元)的资金支持。

科技高等教育协会(Technological Higher Education Association)负责人约瑟夫·莱恩(Joseph Ryan)对该结果非常满意, 他表示:“我们欢迎各种方式的投资, 并期望有更多的资金投入都柏林工业大学的东南地区、蒙斯特和康奈克三地。本周, 我们将代表技术型高等教育部门向财政部提交一份预算报告, 说明我们在 2019 年所需的预算资金。在这份文件中, 我们将要求财政部长帕尔多·诺霍(Paschal Donohoe)增强对科技类高等教育领域的信心, 并为建立可持续的融资模式打好基础”。

(翻译 / 黄宗坤 校对 / 白静)

[来源: 爱尔兰《日报网》, 2018 年 7 月 17 日](#)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决定缩减国际学生招收规模

2014 年以来, 澳大利亚国际学生人数的快速增长给学校的管理带来压力。在此背景下,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决定暂停招收国际学生。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副校长布莱恩·施密特(Brian Schmidt)认为,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已经达到了较为合适的规模, 如果学生规模继续扩大, 学校不会变得更好。施密特教授表示:“目前全日制学生人数已达到约 2 万人, 我们不打算扩大国际或国内招生”。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称, 自 2013 年至 2016 年,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国际学生人数从 5,590 人增加到 7,425 人, 共计增加了 1,935 人, 是同期澳大利亚本地学生增加人数的两倍多。在全国范围内, 国际高等教育学生入学人数从 2013 年的 187,000 人增加到 2018 年的 319,000 人。施密特教授评论说,

过去几年国内和国际学生人数都在大幅增加, 国立大学目前已经达到了它能承受的最大规模。来自新加坡的 22 岁的法学院学生塞缪尔·李(Samuel Lee)却表示, 他喜欢这种学生融合的氛围, 他说: “在你熟悉的社会群体之外接触更多拥有不同的观点和文化背景的人是一件好事,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很独特, 来到这里的大多数学生不一定是堪培拉当地人, 而这也使得这所大学变得更加温暖”。

(翻译 / 张兴 校对 / 刘蓉蓉)

[来源: 澳大利亚《硕士在线网》, 2018 年 09 月 07 日](#)

印度: 政府严厉打击欺诈性期刊

大多数学者认为欺诈性期刊是科学界的毒素, 但是在印度, 许多大学建议将这些期刊纳入国家批准的“白名单”中。印度政府目前正严厉打击这类行为, 并要求大学在 2018 年 8 月底前修改他们对于期刊“白名单”的建议, 以规避欺诈性期刊对科研经费的浪费。许多研究发现, 欺诈性期刊的出版商大多在印度, 而且这类期刊发表的文章多出自印度学者。印度学者将这种现象归咎于印度的学术成绩评估制度。2010 年, 印度高等教育监管和资助机构——大学拨款委员会(the University Grants Commission)推出的学术评估系统中, 学术发表的数量占有重要比例。研究者认为这是在鼓励学者和大学专注于出版数量而非质量。

为扼制在欺诈性期刊上发表文章的现象, 大学拨款委员会在 2017 年 1 月发布了一份符合标准的期刊名单, 但有研究者指出, 名单中还是包括欺诈性期刊。2018 年 5 月, 大学拨款委员会以质量低、资料提供有误或不足为由从名单中移除 4305 种期刊。委员会主席乔汉(Chauhan)指出, 委员会将引入更严格的准入标准以减少欺诈性期刊的数量。天体物理学家肯布哈维·哈吉特(Ajit Kembhavi)认为, 印度学术界需要提高对于欺诈性期刊的防范意识并对学者进行学术伦理教育, 同时也要改革政府的学术评估和资助制度。

同样, 在中国, 许多大学根据学术文章的发表数量奖励学者, 对此, 政府也将公布一份“黑名单”, 揭露质量不过关或为了盈利而设立的期刊, 在这些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将不会被计入奖励或资助申请中, 作者也会收到警告。

(翻译 / 魏青鸾 校对 / 杨建华)

[来源: 英国《自然》, 2018 年 08 月 28 日](#)

非洲: 三十名未来科学家获得女性专属奖学金

来自布隆迪、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卢旺达、坦桑尼亚、赞比亚、乌干达及马拉维的 30 名科学领域的年轻女性研究生获得了 2018-2019 年度世界银行非洲卓越中心(African Centres of Excellence II)项目的硕士奖学金。奖学金获得者可以选择在涵盖工业、农业、卫生、教育和应用统计等领域的二十四个非洲卓越中心之一进行全日制学习。该奖学金旨在推动非洲青年女科学家接受研究生教育、鼓励区域学生流动以及培养该地区未来的领导者。此项奖学金涵盖了高额的学费、生活津贴、研究经费、往返交通费等。此前, 很少有女性申请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学科的研究生课程, 这些领域主要由男性主导。

此项女性专属奖学金的设立则希望改变这种状况。

该奖学金项目对于非洲未来发展的意义重大。首先, 该项目将有助于提升该地区一些正在发展的工业部门的水平, 满足石油、天然气、能源和采掘垦殖等行业对研究生的大量需求。其次, 该项目将有助于培养女性研究生成为农业综合企业专家或管理人员、农作物科学家、植物育种家等, 从而应对非洲农业领域所面临的挑战。再次, 该项目通过在分子生物学、分析流行病学、传统医学和制药生物技术等领域进行人员培训和相关研究, 有望帮助应对当地传染病、公共卫生和药物开发领域所面临的挑战。最后, 世界银行还期望该项目能够提升非洲高等教育研究与教学质量, 特别是统计学方面的技能和政策制定的能力。

(翻译 / 郭鑫 校对 / 黄亚鑫)

[来源: 英国《大学世界新闻》, 2018 年 08 月 31 日](#)

学术前沿

《学者的工作满意度: 科研产出的作用》

本研究以西班牙学者为例分析了学者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 特别关注了科研产出的作用以及不同学者群体之间的差异。在学术生涯的不同阶段, 科研产出都是工作满意度的重要影响因素, 但不同群体工作满意度受科研产出和其他因素影响的程度存在差异, 其他影响因素包括其他科研相关指标(如与国外学者合作情况)、教学压力、婚姻状况、子女成长情况等。本研究发现, 科研产出和工作满意度高度相关。科研工作需要更多的内生动力。外部激励有助于科研人员完成趣味不大但却很重要的工作任务, 但并不一定有助于提升内在动力。希望提高科研生产力和稳定性的高等教育机构应当调整激励机制, 使其充分反映学者这类特殊群体的需求, 从而激发他们的内在动力。

(翻译 / 金雨琦 校对 / 魏青鸾)

[来源: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高等教育研究\), 2018 年 8 月刊](#)

Albert, C., Davia, M. A., & Legazpe, N. (2018). Job satisfaction amongst academics: the role of research productivity.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43(8), 1363-1377.

《研究小组作为实践共同体——关于四个高绩效研究小组的案例研究》

在研究人员普遍面临激烈竞争、承受高等教育机构内外双重压力的背景下, 本研究调查了高绩效研究小组的组织形式。为了探索研究人员如何应对这些压力, 本研究对丹麦和荷兰的四个高绩效研究小组的实践行为和理念进行了探究, 并讨论了这些研究小组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实践共同体”(communities of practice), 又或是他们展现的是“正式团队”的特点。已有的研究显示了实践共同体对组织绩效的益处。本研究进一步表明, 这些高绩效的研究小组确实表现除了“实践共同体”的特点, 而非“正式团队”的特点。本文作者认为, 许多旨在促进科学进步的激励机制都更多引导“正式团队”的形成, 而非“实践共同体”的形成。这些机制过多地关注了团队的组织, 强调规范的工作流程、明确的工作

目标、重要的时间节点、任务分工和上下级的组织关系等。本文表明，这些激励机制是否真正能够提升研究绩效是有待商榷的。

（翻译 / 武岳 校对 / 郭鑫）

来源：[Higher Education \(高等教育\)](#), 2018 年 8 月刊

Lise Degn (2018). Research groups as communities of practice—a case study of four high-performing research groups. *Higher Education*, 76(2), 231-246.

《学术界商业人士的边界工作:对博士后培训的启示》

本研究采用边界工作(boundary work)和场域理论(field theory)两个概念框架，指出学术科学家划分科学和市场边界的策略如何影响职业的社会化进程。其主要关注点为场域理论对群体差异、权力和领域内规则的强调如何为边界工作的分析提供参考。此研究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一是学术科学家如何划分科学领域与市场领域，二是非商业型科学家、研究生和博士后科学家在商业导向型科学家的边界工作中扮演什么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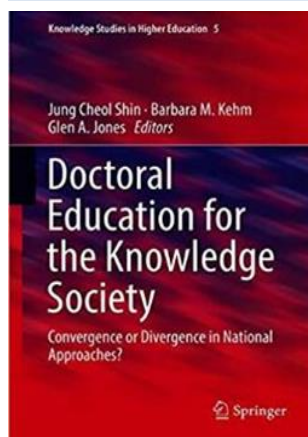
通过对商业研究型大学的 61 位商业主义科学家和传统主义科学家的深入访谈，本研究发现了三项划分科学和市场边界的“规则”。商业主义者对这些规则的遵循转化为一种对第三方印象管理的特定实践。在这种实践中，商业主义者利用博士后科学家将科学从市场中分离出来。博士后科学家身份的模棱两可首先源于他们自身介于正式教育和长期职位之间的受训者身份，同时又因为商业型导师将他们置于科学领域和市场领域之间而更加强烈。研究结果表明，当前为保证教授工作范畴一致性所采取的措施有可能会阻碍博士后的社会化进程，并对学术职业的长远健康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翻译 / 李晶 校对 / 张兴）

来源：[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高等教育杂志\)](#), 2018 年 4 月刊

Johnson, D. R. (2018). The Boundary Work of Commercialists in Academe: Implications for Postdoctoral Training. *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89(4), 1-24.

书籍推荐



《知识社会的博士生教育：趋同还是分化？》

随着全球知识社会高端人才竞争的日益激烈，许多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对博士生教育和训练的重视程度显著提高。博士生教育是基础设施研发的关键要素，博士生是高校科研的重要支撑力量，代表了下一代的教授群体。虽然博士生教育在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中受到了相当多的关注，但目前对博士生教育结构和当代教育改革本质进行的国际和比较研究仍然寥寥无几。基于以上考量，本书探讨和比较了 12 个国家和地区的博士生教育体系，其中包括 4 个东亚体系（日本、韩国、中国、中国台湾）、4 个欧洲体系（德国、瑞典、

瑞士、葡萄牙）和 4 个英美体系（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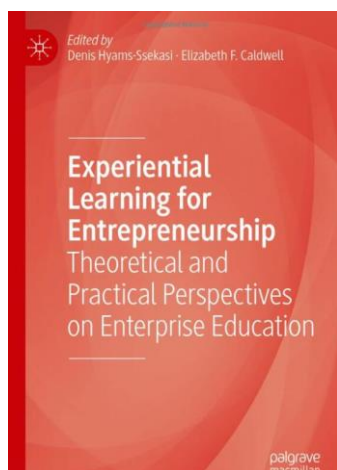
（翻译 / 王倩 校对/蓝晔）

作者：Jung Cheol Shin, Barbara M. Kehm, Glen A. Jones

出版日期：2018 年 09 月 16 日

出版商：Springer

来源：<https://link.springer.com/book/10.1007/978-3-319-89713-4#about>



《创业教育中的体验式学习：从理论与实践的视角解读创业教育》

本书为创业教育提供了具有启发性的概述，并提出现有教育机构是否具备适宜的体系来帮助学生为以后的工作做好准备的问题。为满足劳动力市场对具备实践技能和专业知识的毕业生的需求，本书用一系列富有洞悉力的章节分析了在政策支持的环境中，如何让创业者具备企业经营所需要的技能并让其体验从创立到管理一家企业的整个流程。本书全面讨论了在高等教育项目以及工作场所中进行体验式学习的实证案例，对于研究商业公司、企业家精神和高等教育的人来说是一本重要且及时的读物。

（翻译 / 赵丽文 校对 / 刘蓉蓉）

作者：Denis Hyams-Ssekasi, Elizabeth F. Caldwell

出版日期：2018 年 07 月 01 日

出版商：Palgrave Macmillan

来源：<https://www.palgrave.com/cn/book/9783319900049#aboutBook>

专题：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形象（评论/新闻/学术前沿/书籍推荐）

中国——新兴的国际高等教育枢纽

21 世纪初以来，区域教育枢纽建设已成为跨境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作为全球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国际高等教育枢纽也被周边国家视为重要的战略机遇，各个国家需根据其相对优势采用差异化的战略。中国正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建设国际高等教育枢纽，以在国际高等教育领域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中国于 2013 年正式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这一前所未有的多边合作框架，“一带一路”作为国家级顶层合作倡议写下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篇章。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教育具有双重功能，在巩固各国人民友谊的同时，也能通过充分的人才培养为进一步扩大国际合作打下基础。因此，中国有强烈的意愿推动建设国际高等教育枢纽，并愿意在此过程中承担更多责任。

中国在国际高等教育枢纽建设的竞争中具备以下相对优势：

第一，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具有稳定性。建立国际高等教育枢纽是一项需要长期稳定的资源投入

和政策支持的系统性工程，中国已经制定了深化高等教育国际化建设的核心政策，并保证了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第二，经济转型和科技创新为高等教育国际化提供了潜在机遇。随着中国经济的创新驱动转型，其经济和技术创新为世界各地的专业人员和商界人士创造了新的机遇，了解中国和学习中文也被广泛认为是全球个人职业发展中十分有价值的能力。

第三，高等教育质量的实质性提升。教育质量是建设国际高等教育枢纽的基础，从“211 工程”、“985 工程”到“双一流”建设，中国高等教育质量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中国大学登上世界大学排行榜，特定领域的基础性研究和应用型研究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千人计划”等政策的出台也使海外学者纷纷归国，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中流砥柱。

第四，强大的地缘政治影响力。政府间合作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推动力，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不仅致力于与发达国家进行合作，而且注重深化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关系，建立“金砖国家峰会”、“中非合作论坛”等区域性多边合作机制。

第五，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为填补人才缺口，中国政府强调教育合作应致力于满足合作伙伴的实际需求，通过加强双边合作推动合作国的工业发展，通过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吸引国际学生回到本国工作，并且鼓励国内顶尖大学与合作国的本土大学或第三方机构合作设立海外分校。

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致力于建立多中心的高等教育枢纽系统，不同的子枢纽具有不同的功能，反映了中国的地理与文化多样性，并服务于特定的经济走廊和战略方向。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正在努力与周边国家进行合作，以改变传统分散结构模式下国家话语权分配不均的问题，激发合作网络的潜力，推动全球高等教育管理模式的改革。

然而，中国的高等教育枢纽建设仍存在挑战。从长远来看，高度分化的高等教育系统中由于激烈竞争所造成的人才危机，可能会对子枢纽，特别是西部枢纽的支柱高校，乃至整个系统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教育部门必须提供有效的政策支持，以协调高等教育机构间的人力资源分配。此外，全民教育资格框架和质量保障机制应被推广以促进区域就业标准一体化。

中国成为国际高等教育枢纽的发展规划不仅受益于“一带一路”的强大推动力，并且植根于其独特的相对优势，这与当前国内发展与全球高等教育改革的需求相一致，但也面临着根深蒂固的结构性风险和挑战。无论最终结果如何，这都将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性尝试。

（翻译 / 黄亚鑫 校对 / 周默涵）

[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视》，2018 年 09 月 04 日](#)

中国终止国际高等教育项目意味着什么？

2018 年 7 月初，中国教育部叫停 229 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和 5 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自本世纪初以来，中国政府一直试图减少和终止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非学位项目，而这一次的情况似乎比以往更加复杂，并将对这些机构和项目的未来发展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国际合作机构和项目就开始在中国出现。初期，中国政府实施了多项政策，鼓励本土大学和国外机构建立国际合作并允许提供非学位、双学位和联合学位项目。有两个主要因素促成了这些机构和项目的迅速发展：一是由于 21 世纪初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仅在 12% 左右，政府尝试通过提高国际合作机构和项目的学生人数来扩大中国的高等教育规模，满足日益增长的高等教育需求；二是引进境外大学的教育理念、课程和项目安排以及管理思路被视为是提高中国高等教育学术质量和水平、促进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种快捷而有效的方式。

2016 年 2 月，中国政府明确表示，应加大力度终止不符合政府质量标准的国际合作机构和项目。这表明政府已将政策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保证。中外合作办学的机构和项目需要通过国家标准的认可，而且在运营期间还需要接受政府的定期外部评价、审核或检查。根据最新的政府公告，截至 2018 年 7 月，大约有 10% 的机构和项目（包括非学位项目）不再被允许招收新生。终止这部分机构和项目的原因在于：首先，政府自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以来，一直试图对国际合作项目和机构施加更直接和严格的管制，管制的重点在于质量保证。其次，中国高等教育将很快进入大众高等教育阶段，不再需要通过中外合作办学促进中国实现大众高等教育。再次，许多国际合作机构和项目的教学质量与研究质量差、条件差，受到包括毕业生、学生家长、雇主和大众媒体等各种利益相关方的批评。最后，即将被终止的项目中，绝大多数集中在商科、会计学、国际贸易和管理学等学科，所终止的项目为中国的国家发展与科技进步做出的贡献较为有限，项目产出与政府期望不匹配更为明显。

中国政府在运营和发展国际合作机构和项目方面实施了新的政策。新政策涉及保证合作机构与项目的高质量、提供更高水平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学科项目，尤其是能够帮助中国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新兴学科项目，以及与世界一流大学开展合作等方面。这些新的规定将不可避免地影响中国未来新的国际合作机构和项目的规模和质量。因此，尽管中国将继续鼓励发展符合国家发展计划的优质项目，但也将采取更加严格和谨慎的态度进行审核，且将以内部质量保证和外部评估的方式对合作项目进行更直接的监管。

（翻译 / 蓝晔 校对 / 杨建华）

[来源：英国《大学世界新闻》，2018 年 8 月 24 日](#)

中美两国引领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2018 年 8 月 15 日，2018 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 ARWU)正式发布，中国和美国分别增加了 6 所和 4 所位列全球前 500 名的高校，成为本年度排名的最大赢家。

与往年 ARWU 榜单相比，今年 ARWU 排名前十的大学并无变化，哈佛大学连续第 16 年蝉联榜首，其余排在前十名的高校依次为斯坦福大学、剑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普林斯顿大学、牛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加州理工学院和芝加哥大学。前 20 名的大学中仅有 3 所大学变换了位次。

美国高校雄踞今年 ARWU 榜单的前 500 强：8 所美国高校位列全球前十，46 所位列全球前 100，

139 所跻身全球前 500。中国共有 62 所高校跻身全球前 500 名, 其中 3 所位列全球前 100。ARWU 团队的成员表示, 中美两国是今年排名的最大赢家, 不过两国前 500 名高校数量的增加意味着其他国家上榜高校数量的减少。中美两国高校在排名中的表现说明, 相比于其他国家, 两国高校取得了更大的进步。

欧洲大陆方面,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排名最高, 位居第 19 位, 紧随其后的是位居第 31 位的哥本哈根大学。由原巴黎第六大学(Pierre and Marie Curie University)与巴黎第四大学(Paris-Sorbonne University)合并组建的索邦大学(Sorbonne University)位居第 36 位。在 ARWU 榜单前 500 强的亚洲高校中, 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保持着领先地位, 清华大学位居亚洲第三。浙江大学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首次跻身世界前 100 名, 西北工业大学等 10 所高校首次进入世界前 500 名。

ARWU 团队成员同时指出, 由于高校的表现相对稳定, 每年的大学排名一般来说不会变化很多。部分高校名次的上升恰恰说明高校取得了较为显著的进步, 这对于高校、政府、政策制定者以及公众都非常重要。ARWU 去年首次公布了 501-800 名的高校, 今年的榜单继续扩展到了前 1000 名。在作为全球前 500 强高校候选的第 501-1000 名高校中, 中美两国所占份额最大, 分别有 84 所和 78 所高校。

(翻译 / 高磊 校对 / 李欢)

[来源: 英国《大学世界新闻》2018 年 8 月 14 日](#)

中国正在崛起: 中国的研究影响力有望超越美国

最新分析显示, 到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 中国在研究质量的关键指标上可能赶超美国, 这将对全球学术合作产生重大影响。斯高帕斯(Scopus)学术研究数据库的趋势分析表明, 中国整体的论文引用影响力提升迅速, 有望在短短的七到八年内赶上美国。

斯高帕斯数据库所有者爱思唯尔公司(Elsevier)副总裁埃尔·艾萨提(M'hamed el Aisati)考察了研究领域加权引文影响力(field-weighted citation impact, FWCI)的最新趋势, 并以此估计中国何时会赶超美国。他表示, 中国的 FWCI 已从 2012 年的 0.78 上升至 2017 年略低于世界平均值 1 的水平; 同期美国却从 1.47 降至 1.34。若保持这一趋势, 两国的 FWCI 将在 2025 年到来之前实现交汇, 同时他也提到, 许多因素可能会加速或延迟两国之间 FWCI 的交汇。

过去曾有疑问指出, 文献引用是否足以反映中国文献质量的提升, 人们担心中国会受到学术欺诈的困扰, 如对同行评审程序或访问教授职位的滥用。然而, 中国研究质量的提高得到了其他数据的支持。基于斯高帕斯数据库的图表, 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U.S. National Science Board)于 2018 年 1 月发布的科学政策建议报告显示, 2000 年到 2014 年间, 中国在科学和工程研究领域排名前 1% 的引文比例翻了一番。此外, 最新发布的《自然》杂志引用指数也显示, 西方国家作者占比下降的同时, 中国作者的占比在一年内上升了 13%。

艾萨提认为, 欧洲和其他国家完全有可能最终将中国作为某些学科质量的衡量基准, 这可能使得中国研究人员日益成为他国学者跨国合作的首选。荷兰乌得勒支大学(Utrecht University)的马瑞克·范德

文德(Marijk van der Wende)教授表示, 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的报告中有大量对中国的评论, 同时还分析了中国如何真正成为世界上一个重要的科技力量, 这表明美国敏锐地意识到其地位受到了严重挑战。范德文德认为, 中国研究的崛起主要集中在面向经济增长和地缘战略定位的一少部分科学领域, 这也导致了艺术和人文学科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与此同时, 英国莱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Leicester)中国研究质量分析学者、教育学讲师张薇指出, 尽管中国学术声望的崛起将打破美国在卓越研究方面的霸权, 但这并非中国政府的直接目标。她认为, 提高研究质量是政府的次要考虑因素, 以国家科研振兴为主要推动力, 使中国从劳动密集型经济向技术密集型经济转型成功, 才是中国的内在目标。张薇表示: “中国为克服挑战、减轻风险, 必须始终站在科学技术与创新的前沿。这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翻译 / 刘晓雯 校对 / 高磊)

[来源: 美国《高等教育内视》, 2018 年 07 月 19 日](#)

教育投入推动中国创新指数排名提升

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美国康奈尔大学和欧洲工商管理学院法国校区(the French business school Insead)发布的 2018 年全球创新指数排行榜显示, 中国创新领域的排名上升了 5 位, 超越了加拿大、挪威、奥地利、新西兰和冰岛, 位列第 17。中国在大学与研发方面的大量投资成功推动本国跻身全球最具创新性的 20 个经济体之列。

参与全球创新指数编制的还包括印度和巴西的商业代表机构以及普华永道国际会计事务所。排名结果根据教育、研究、基础设施、市场和商业成熟度、政治和监管效率以及专利、商标和创意服务出口等总计 80 个指标计算得出, 其中教育和研究类指标占 12 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斯·高锐(Francis Gurry)表示, 中国是唯一进入创新指数排名前二十的中等收入国家。排名的快速提升反映出国家的战略部署方向, 即发展世界一流的创新实力, 推动以创新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为基础的经济结构转型, 保持竞争优势。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示, 中国创新能力的提升以及瑞士、荷兰、瑞典等国家均已证明, 教育和科研投入可以转化为高质量的创新产出。在排名中, 瑞士连续八年位居榜首, 荷兰和瑞典分别位列第二和第三, 英国和新加坡分别为第四、第五名, 以色列和澳大利亚的排名也有所提升。然而, 作为老牌创新强国的美国, 其排名却下滑了两位, 跌落至第六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还强调, 考虑到各国发展水平的不同, 哥伦比亚、突尼斯、南非、哥斯达黎加等国的创新能力超出预期。此外, 该创新指数突出强调产出了大量科学出版物和专利的科技聚集区的作用, 日本的京滨工业区排名第一, 紧随其后的是深港创新圈、首尔创新园和美国硅谷。

(翻译 / 蒋雅静 校对 / 赵丽文)

[来源: 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 2018 年 07 月 10 日](#)

中国正在成为非洲学生的主要留学目的地

非洲与西方高等教育一向颇有渊源。虽然高级学习中心(centres of advanced learning)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就已存在, 但非洲现有的高等教育机构起源于殖民时代。尽管 20 世纪 60 年代的民族主义和独立运动浪潮席卷非洲大陆, 西方高校仍是非洲学生的主要留学目的地。

不过, 这一形势在近几年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尽管法国仍然是最受非洲学生欢迎的留学目的地, 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显示, 中国的非洲留学生人数已赶超英美两国。20 世纪 50 年代始, 非洲学生逐渐向中国流动, 千禧年后则呈指数增长, 到 2014 年, 每年前往中国的非洲留学生已逾 4 万人。

非洲学生来华留学趋势的迅猛发展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 撒哈拉以南非洲长期不佳的经济状况使得能够负担西方高等教育费用的学生人数非常有限。其次,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西方国家不断收紧移民政策, 也影响了非洲学生的留学选择, 近期更是受到英国脱欧和美国总统选举的影响。此外, 面临着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学科人才培养缺口的问题, 非洲自身难以满足当地的高等教育需求。虽然非洲大陆在过去 20 年大幅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 但仍未能跟上人口增长的步伐, 非洲大陆的高等教育入学率也因此居全球末位, 仅有 14%。

与此同时, 中国优质的高等教育(特别是越来越多的具有西方留学背景的师资)和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对非洲学生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中国勇敢地抓住了全球发展进程中的契机, 实现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与文化利益。在非洲, 中国提供了许多与“一带一路”倡议和中非合作论坛中“南南合作”议程相契合的奖学金计划, 非洲国家涌现的诸多孔子学院也推动了来华留学趋势的增长。如果说非洲 20 世纪的知识巨匠多由西方高等教育体系加持, 那么其 21 世纪的学术大师们将极有可能毕业于中国高校。

(翻译 / 薛慧林 校对 / 刘晓雯)

[来源: 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 2018 年 8 月 9 日](#)

《来华留学生的就读经历研究: 规划性逆向流动是否有效?》

近年来, 由于中国全球影响力、经济和国际参与的快速发展以及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 越来越多的国际学生选择来华留学。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进程正受到发展型国家理论(development-state thesis)指导下的政府导向计划与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指导下的高等教育机构的双重影响, 因此, 来华留学生的规模与特征、留学动机、分布学科和来源国家都与传统发达国家存在根本差异。然而, 目前针对来华留学生群体的本土调查却寥寥无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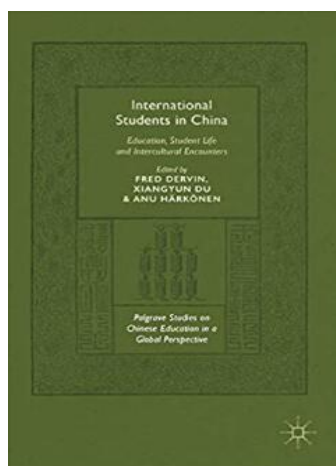
本研究基于全国范围内的国际学生普查数据和自主开发的“来华留学生学习经历和满意度调查问卷”, 运用混合研究方法对 1674 名国际学生在中国大学的就读经历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 中国正在逐渐成为发展中国家学生, 尤其是邻近的亚洲国家学生的重要留学目的地。与此同时, 来华留学生也面临着多重挑战, 主要包括英语学习资源有限、师生互动不足、社会文化适应困难等。为吸引更多国际学生来华就读, 政府层面应出台针对国际学生教育的战略计划并健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高校层面应关注和改善教学工作并切实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学者层面应积极在宏观和微观层面针对来华留学

生进行系统研究。本研究从来华留学生的视角分析了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历程和方向, 通过调查国际学生在中国的学习和社会文化体验, 概述了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主要优势和局限性, 填补了当前留学生逆向流动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 并为未来的研究和国家政策制定提供了方向。

(翻译 / 张国洋 校对 / 周默涵)

来源: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国际教育发展研究\)](#), 2018 年 07 月刊

Wen, W., Hu, D., & Hao, J. (2018). International students' experiences in China: Does the planned reverse mobility work?.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61, 204-212.



《高等教育与中国的全球崛起：一个新视角》

本书考察了中国在国际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全球形象崛起。这种崛起体现在中国人力资本的增长、学术刊物知名度的提升、世界大学排名的赶超、国际文化影响力的扩大以及逐渐成为国际学生主要留学目的国等方面。本书指出了近一个世纪以来高等教育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外交角色, 并分析了中国作为世界大国是如何塑造这一外交角色的。本书解读了高等教育与中国国际影响力之间的联系, 并讨论了中国的高等教育如何反映了中国的国际关系, 特别是中国作为全球大国而崛起的目标、方式和性质。当前, 中国崛起问题主要被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比较高等教育领域的探讨所主导, 本书将有助于拓宽对这一问题的相关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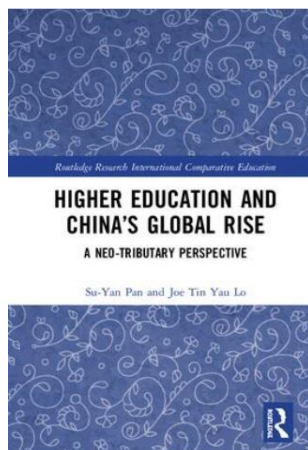
(翻译 / 李欢 校对 / 王莹)

作者: Su-Yan Pan, Joe Tin Yau Lo

出版日期: 2018 年 06 月 11 日

出版商: Routledge

来源: <https://www.routledge.com/Higher-Education-and-Chinas-Global-Rise-A-Neo-tributary-Perspective/Pan-Lo/p/book/9781138680623>



《来华留学生：教育、学生生活和跨文化交流》

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高校国际学生人数的稳步增长,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在华国际学生的多种多样的经历。本书以来华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软技能、文化交互性、语言学习策略和观念转变等为主题, 为读者介绍了有关来华留学生研究的最新进展。这本书不仅会吸引对中国高等教育感兴趣的研究人员、教育实践者和学生, 而且会吸引所有对跨文化研究感兴趣的人。

(翻译 / 杨馨缘 校对 / 张国洋)

作者：Fred Dervin, Xiangyun Du, Anu Härkönen

出版日期：2018 年

出版商：Palgrave Macmillan

来源：<https://www.palgrave.com/cn/book/9783319781198#aboutBook>

读者意见征集

《国外研究生教育动态》自创刊以来受到了多方的关注与关心，您的关注是我们始终努力向前的最大动力。为不断改进刊物质量，如各位有任何建议，比如您比较希望关注的内容或者国家等，都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联络：

邮箱：cehd@sjtu.edu.cn

电话：021-3420-5941 转 28

编辑：朱佳斌 郑天一

编辑助理：张国洋

版权声明

本刊登载的所有内容均来源于网络，读者可将本刊内容用于个人学习、研究或欣赏，以及其他非商业性或非盈利性用途，但同时应遵守著作权法及其他相关法律规定，不得侵犯本刊及相关权利人的合法权利。如欲转载，请与本刊联系。

《国外研究生教育动态》

《国外研究生教育动态》每月及时选载世界各地报刊媒体和高等教育组织机构发布的最新信息和观点评论，全面报道国外研究生教育最新动态。本刊致力于帮助我国研究生教育决策和管理者、研究生教育研究者、研究生教师等相关人士，了解国外研究生教育的最新动态、不同观点、重要数据和研究成果，加强中外研究生教育的比较和借鉴，以促进我国研究生教育工作者在国际视野下更切合实际、更有竞争力和更富创新求是精神地开展工作。

编辑：朱佳斌、郑天一 编辑助理：张国洋

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育教学与人才成长研究中心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800号

邮编：200240

邮箱：cehd@sjtu.edu.cn